

Feb. 28

2023

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25 期)

# 全球治理中的 多边开发银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 (CASS)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IWEP)

本期执笔

苏山岳 姚慕燃 李升阳  
孟思宇 牛嘉城 杨 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治理研究团队成果发布  
Glob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 专题序言

多边开发银行是促进国际发展融资、加强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机构。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中国成立了亚投行，在国际上展示了专业、高效、廉洁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崭新形象。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及其他多边开发机构亦对“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了诸多支持。本期学科动态以全球治理中的多边开发银行为主题，梳理了当前全球开发银行架构，分析了亚投行产生的影响，并从国际制度竞争、国际规范塑造、战略性外交等角度为理解多边开发银行的运作和效果提供参考。

## 本期目录

1. Jing Qian, James Raymond Vreeland, and Jianzhi Zhao, “The Impact of China's AIIB on the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thcoming.
2. José Antonio Ocampo and Victor Ortega, “The Global Development Banks’ Architecture,”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4, No. 2, 2022.
3. Ayse Kaya and Matthew Salah, “When Do Established Powers Support Rising Powers’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The Case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5, No. 1, 2022.
4. Mahrukh Doctor, “Development Banks as Instruments of Brazilian Strategic Diplomacy,”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28, No. 1, 2022.
5. Susan Park, *The Good Hegemon: US Power, Accountability as Justice, and the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6. 汪建新：《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与全球贸易增长：以加入亚投行为例》，《世界经济》，2022 年第 12 期。

## 本期审校

陈兆源、杨嘉豪



**No. 1**

**Jing Qian, James Raymond Vreeland, and Jianzhi**

**Zha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thcoming**

## “The Impact of China's AIIB on the World Bank”

### 《亚投行对世界银行的影响》

多年以来，世界银行在美国主导下一直在国际发展融资领域扮演全球领导者的角色。然而近年来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该领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本文是一篇运用计量方法的实证研究，通过关注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在世行中的借款实践，使用新的因果推断方法并使用多种稳健性检验，发现亚投行创始国参与世行基础设施项目的数量暂时减少，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在国际发展融资领域内，亚投行和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的关系。

首先，作者对世界银行的运营现状和亚投行的成立背景进行了简单介绍，说明世界银行当下面临的各种问题，包括发展政策不可持续、项目审批时间长、基础设施项目融资能力不足，以及经常附加政治条件等引人诟病的现象。同时还说明了亚投行崛起的因素：银行庞大的规模和雄心，美国和日本的缺席，中国作为引领者。

其次，作者分析了亚投行的竞争优势以及部分创始成员对世行的背离行为引发的挑战。作者提出，虽然世界银行试图通过赋予新兴国家更大的话语权，以及改善代表性不足等现象的方式拉拢出现背离倾向的成员，然而出于对西方政治主导的不满以及对领导地位上升的认可等因素，部分成员国依旧表现出了对亚



投行的青睐，从而引发了本文的研究困惑，即亚投行的建立是否会影响世行在国际发展融资领域的主导地位。对此作者给出了肯定的判断，并假设造成这种背离的源头是贷款“需求端”（亚投行创始国的决定）或者是贷款“供给端”（世行的决定）。

接着，作者给出了本文的数据集来源——包括从 1992 年到 2019 年间至少参与一个世界银行项目的总计 155 个国家，并对亚投行创始员国的编码策略、世行基础设施项目的分类编码规则以及控制变量的选择进行了说明。同时，作者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工具——庞珣等人最新发表的“动态多级潜在因子模型”（DM-LFM），并对上述数据进行了处理。结果表明：DM-LFM 适用于本文的数据，并且结果支持作者的假设。亚投行成立后，发起国从世界银行获得的基础设施项目年均减少 0.66 个，降幅约 22%。此外，该结果还顺利通过了安慰剂检验，表明结果并不因发起国在 2016 年亚投行成立前在世行获得贷款的多少而受到影响。

通过对实证检验的分析，作者发现，背离世行的行为是亚投行创始国的决定驱动的，因为“创始国与中国之间日益密切的政治联系确实导致与世行的基础设施项目减少”。作者指出，美国并不会因为这些国家与中国交好而在世行中动用其“一票否决权”，或是减少与上述国家在非基础设施项目中的合作。也就是说，美国并不因为背离行为而惩罚上述国家。但作者通过采访世行有关人员得知，世行“确实试图赢回更多项目”。

最后，文章发现如果创始国简单地将世行项目替换为亚投行项目，亚投行项目可能会“排挤”类似的世行项目。作者构建了一个结合了世行和亚投行基础设施项目的“反事实”衡量标准，这一措施在分配亚投行项目时，就好像是由世界银行提供的一样。结果发现，创始国在没有亚投行替代项目的情况下也会减少与



世行的互动。作者据此判断，由于厌恶世行提出的政治附加条件，创始国正减少与世界银行的互动，更加偏爱亚投行承诺的轻松和高效。

本文最大的贡献在于，该研究是第一篇应用庞珣等人提出的“动态多级潜在因子模型”（DM-LFM）的文章，在方法论层面极大推动了“中国在国际发展领域中日益提升的影响力”研究的相关理论进展，丰富了相关领域的学术文献，为后续的研究做出了示范，奠定了良好基础。

编译：苏山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 2****José Antonio Ocampo and Victor Ortega***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34, No. 2, 2022.****“The Global Development Banks’ Architecture”****《全球开发银行的架构》**

本文系聚焦全球开发银行体系架构情况的一篇专题报告。在文章中，作者详细阐述了多边开发银行（MDB）及国家开发银行（NDB）的发展进程、现有体系及影响范围情况，并针对性提出了要将 2 类银行系统化运作、将开发银行进一步资本化以支持疫后经济复苏等建议。

**一、开发银行的发展历程**

全球开发银行体系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当时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崩溃，促使各国政府创立了公共金融机构，比较典型的就是 1934 年成立的美国进出口银行（EXIM）。二战后，开发银行体系迎来飞速发展期，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欧洲投资银行（EIB）、美洲开发银行（IADB）等陆续建立；至上世纪 70 年代，已形成包括全球、区域、次区域、国家和次国家级机构在内，由 400 余家实体组成的开发银行体系。上世纪 80 年代，由于市场化改革议程的兴起，有“国家要素”存在的开发银行体系曾受攻击，声势略衰，但至本世纪初又重获关注，并因其独特反周期作用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肯定。

**二、开发银行的预期作用**

本文作者认为，发展“金融机构”必须纠正市场失灵现象中的一些特定问题，



如私人融资的顺周期倾向；金融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特性；市场不愿为高风险活动提供资金；阻碍创新发展等。

以上问题决定了开发银行体系应当致力实现 7 方面价值，助力纠正市场失灵问题：①要提供逆周期融资；②要支持落后国家及地区；③要改善社会发展；④要加强普惠金融；⑤要促进创新和结构转型；⑥要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⑦要支持提供公共产品，特别是应对气变问题的产品。以上七点相互关联，既体现国际共识，又符合各国自身的目标，应当被视为开发银行系统的整体性任务。

### 三、多边开发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体系情况

在本文中，作者将多边开发银行（MDB）及国家开发银行（NDB）作为全球开发银行体系的两大主体分别论述。

**多边开发银行方面**，大多成立于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早期发挥作用明显的系世界银行集团（WBG）下属机构，近期发展速度最快的则是发展中国家所在的“地区性开发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就具体体系而言，可分为世界级、区域级及跨区域级 3 类，共 40 余家机构，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国际金融公司（IFC）、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拉丁美洲开发银行（CAF）、伊斯兰开发银行（ISD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等。其发挥作用地域较集中的分布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等地，多边开发银行 2018-2019 年未偿贷款情况可概略反映其在各地区作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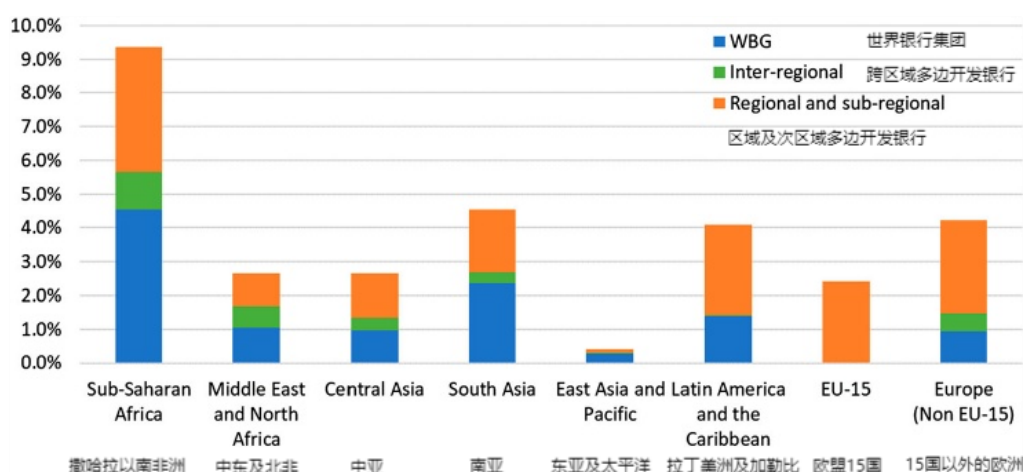


图 1 多边开发银行 2018-2019 年未偿贷款情况 (占地区 GDP 份额)

国家开发银行方面，体系较多边开发银行更为复杂，法国开发署认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政府赞助及公共政策官方授权，有管理性金融工具并依赖预算外资金”的金融机构均可被视为国家开发银行。按其标准，全球现有 400 余家国家开发银行，影响力最强的集中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及欧盟 15 国，相关机构在反周期调节及中小企业普惠金融方面发挥有积极作用。

表 1 国家开发银行体系情况

地区	机构数量	资产 (十亿美元)	资产 (区域 GDP 占比)	投入 (十亿美元)	投入 (区域 GDP 占比)
撒哈拉以南非洲	85	48.8	2.80%	9.8	0.60%
中东及北非	33	287.2	6.60%	57.4	1.30%
中亚	5	68.4	3.20%	13.7	0.60%
南亚	26	129.3	3.60%	25.9	0.70%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	79	4908.7	18.70%	981.4	3.70%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81	486.9	9.20%	97.4	1.80%



北美	19	383.7	1.70%	76.7	0.30%
欧盟 15 国	66	3224.0	19.30%	644.8	3.90%
欧洲(非欧盟 15 国)	31	113.0	3.60%	22.6	0.70%
总计	425	9650		1930	

#### 四、多边开发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的联系及启示建议

作者认为，自 2007 至 2010 年金融危机以来，多边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都在反周期调节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体现出很强的合作性及互补性；根据世界银行最新调查，国家开发银行也一直是多边开发银行贷款及赠款的主要接受者之一，两者间合作对每一方都至关重要。但在实际操作中，作者发现两类银行的关系并没有得到系统性分析，两者间也没有协同的一套标准。对于该情况，作者认为应当将两类银行系统化运作、联网式运行，在合作中互补，在竞争中相互改进。可参考的合作就是，多边开发银行应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南亚等地加大支持、投入力度，帮助当地组建“强大的国家开发银行”（相关地区国家开发银行数量及资金情况见表 1）。

结合全球开发银行体系的预期作用，作者还提出其他两方面的建议：一是要将“反周期调节”作为开发银行的优先事项抓好，在操作中可将多边开发银行进一步资本化，以支持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二是在助力经济复苏的同时要兼顾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发银行要在促进创新、支持减缓类及适应类气变举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编译：姚慕燃



**No. 3**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yse Kaya and Matthew Salah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5, No. 1, 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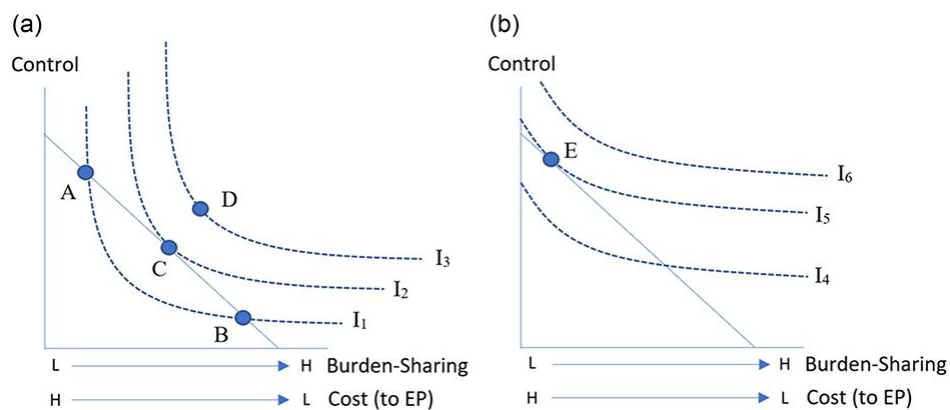
**“When Do Established Powers Support Rising Powers’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The Case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守成大国何时会支持崛起国的多边制度？关于亚开行的案例分析》**

崛起国家经常会尝试通过创建由自己主导的国际多边组织来将自身力量的崛起在全球治理层面上表达出来，但是守成大国在面对这些由崛起国家牵头并可能挑战自身利益的多边组织时并不会总是反对。不论盟友与敌对关系，文章作者认为，崛起国家所牵头的多边组织只要在设计层面上对两个关键问题做出令守成大国相对满意的回答，那么守成大国就会更加愿意加入这些新兴的多边组织。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组织掌控、负担和风险分配之间找到平衡。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让新的多边组织与旧多边组织更好的协调，而非让权力单方面的从旧组织“渗透”到新组织里面去。文章通过对由日本牵头的亚洲开发银行这一案例进行深入的一手资料研究来为这一假设提供证据支持。除了充足的理论贡献外，文章也希望借此研究补充关于美国多边经济政策的相关文献。

通过对已有国际关系和制度理论相关文献的分析，文章指明了传统文献的局限性并设计了一个新的称作“制度权力理论”的理论架构。该理论架构认为，在面对由崛起国家牵头的多边组织时，守成大国最担忧的是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如何最大化自身在这一新兴多边组织里的影响力以及最小化自身在组织里所需要承担的负担和风险，以及如何通过组织设计协调这两个需求。一个国家在多



边组织里的影响力一般通过投票权重和资金管理规章等正式或非正式的条款体现。而负担和风险则体现在会费贡献等财政上的成本以及某些不易量化的非物质成本。文章作者提出，崛起国家和守成大国的敌友关系会影响守成大国在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平衡与取舍，但是不会影响到这个取舍过程的逻辑本身。如果崛起国家与守成大国是盟友关系，那么守成大国的取舍决策会更接近图（a）。图（a）里守成大国有多条对应不同新兴组织制度设计方案的无差异曲线，而通过 $I_2$ 曲线达到的 C 点则是守成大国可达到的最优解。如果崛起国家与守成大国是敌对竞争关系，那么守成大国的取舍决策会更接近图（b）。图（b）里守成大国的无差异曲线更为平滑，代表着守成大国对控制力度更为看重，而通过 $I_5$ 曲线达到的 E 点则是对于守成大国的最优解。



第二大问题是如何确保这个新兴组织不会让权力制度性的从已建成的多边组织渗透出去。当守成大国认为新机构不会过度使权力从旧机构渗透出去时会更加愿意加入新机构。文章认为，当新兴多边组织与旧多边组织在制度规章以及会员组成上重合性高时，二者的互补性就会更高，从而降低权力从旧机构渗透到新机构的可能性。反之，如果两个多边组织的功能相似度高，那么两个机构就会处于直接竞争状态，从而加剧了权力从旧机构渗透到新机构的可能性。

与第一个问题一样，崛起国家与守成大国的敌友关系会对守成大国的决策过程造成影响，但是不会直接影响到这个决策过程的逻辑本身。

本文着重分析由日本牵头的亚洲开发银行这一案例来阐明当崛起盟友发起了国际多边组织时守成大国的决策过程和考虑的变化，从而为这一理论提供更为有力的证据。尽管日本政府努力尝试压低自身与亚洲开发银行的明面关联，这一多边组织毫无疑问仍是日本政府发起的试图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尝试，而其架构和设计都受到了日本战后多次试图推进在亚洲投资计划的影响。美国对于这个项目的态度也经历了从初期的刻意忽视与不支持到 1965 年的逐渐支持。在正式考虑加入亚洲开发银行这一选项之后，美国开始参与关于其制度设计的讨论，并尝试在投票规则、贷款制度设计、总部设立地点、组织功能特殊性以及与世界银行的互补性、拉拢欧洲盟友共同加入以及分享负担等组织架构设计方面向对美国有利的方向拉近。尽管日本是美国的盟友，并且在设计亚洲开发银行这一多边组织的最初阶段就已经考虑到美国的潜在反对做出了让步，美国还是在最终决定加入并接受了部分妥协后提出了大量让步需求。即使美国最终还是加入了亚洲开发银行，其理想诉求仍没有完全达到。文章在结尾阐明了“制度权力理论”目前的三个潜在局限性：

- 1) 该理论无法测量国际上的多边组织数量及密度对这两大关键问题的影响；
- 2) 该理论目前仅适用于美国，不排除其他的守成大国不适用此理论的可能性；
- 3) 该理论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实用性尚未得到完全的检验。

编译：李升阳（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No. 4**

 Contemporary  
Politics
**Mahrugh Doctor***Contemporary Politics***Vol. 28, No. 1, 2022.****Development Banks as Instruments of Brazilian Strategic Diplomacy”****《作为巴西战略性外交工具的开发银行》**

本文研究了巴西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外交政策及其与“战略性外交”的相互关系。作者通过考察 2003-2016 年巴西劳动党（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政府 在多边开发银行中的政策活动，观察了其四个关键性特征：系统性重点、长期目标、对国家利益的动态看法、政治领导力，评估了巴西这类新兴民主国家实施战略性外交的条件与限制。

作者首先对战略性外交进行了定义，对为何研究巴西的案例进行了解释。战略性外交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通过社会建构，构建其世界观、制定其相应议程，进行沟通、竞争和谈判分配核心利益和确定目标的过程”。想要执行战略性外交，同样需要保证适应性和灵活性，国家不仅应当选择一套战略指导其参与（改革）国际制度，同样应该根据国际体系的反应调整其政策。据此，作者选取了 21 世纪初经济“衰退”背景下的巴西作为案例分析对象，将金融治理平台作为考察领域。考察了巴西在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过程中是否符合战略性外交？巴西在多边开发银行中的外交政策是否有助于巴西提高其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

作者认为国际秩序存在互联性、非线性和涌现性。在此环境下，加之全球权力转移的大背景，部署战略性外交意味着对长期前景的规划，同时也意味着对国内社会目标的整体共识。要实现一国的总体目标，还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体制和



官僚专业知识来协同其政策行动。此外在战略性外交部署的进程之中，政策制定者也需要“随机应变”以应对破坏性的危机。据此，作者提出了战略性外交的四个特点：

- 1) 系统性专注，侧重于在国际体系内部的外交，实现参加或改革国际体系；
- 2) 长期性目标，旨在保护政策实施空间和增强国家权力影响力；
- 3) 动态性国家利益，即对系统层面变化与战略突发事件做出反应，从而对国家利益界定进行更新；
- 4) 政治领导，即领导人对国际体系演变的战略远见及其愿意随之部署的资源与能力。

此后，作者考察了 2003-2016 年巴西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开发银行政策的变迁。巴西国家开发银行（BNDES），作为巴西国家干预主义的关键政策工具，巴西政府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扩大了 BNDES 在国内外的作用与活动。到 2010 年首尔峰会后，作为对发达国家不愿进行国际制度改革的回应，巴西转向确保自身发展资源。除了传统支持南美洲区域一体化及其领导地位，巴西政府更多专注于加强其国内跨国公司竞争力。在此背景下，BNDES 成立了专门部门协调在拉美和非洲的行动。尽管到 2016 年受经济衰退影响，其作为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融资者的角色逐渐倒退，巴西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引导巴西国家战略利益”的政策工具的作用仍然是明显的。

同样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新开发银行作为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之外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受到了巴西政府的重视。作者认为，新开发银行的活动具有双重逻辑：为基础设施投融资提供替代途径和加强金砖国家合作制度化以提高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前者，新开发银行的投融资活动与巴西国内的发展主义政策相匹配；后者，罗塞夫政府和卢拉政府都在通过新开发银行来表达对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代表权不平衡的不满，同时以其为平台开展外交。

总之，巴西的最高外交政策目标始终集中在促进国家发展与维护国家主权（扩展政策空间）。作者通过考察巴西在国家开发银行（BNDES）和新开发银行（NDB）中开展的外交政策，考察了系统性重点、长期目标、对国家利益的动态看法、政治领导力四个关键性特征，将巴西在该阶段的外交战略成功归结于一直且连贯的外交政策，从而验证了其对战略性外交的理论定义。

编译：孟思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 No. 5



Dan Honig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023

**BOOK REVIEW: Susan Park, *The Good Hegemon: US Power, Accountability as Justice, and the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 《关于〈善良的霸权：美国权力、作为正义的问责与多边开发银行〉的书评》

世界银行等大型国际组织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问责机制，并通过这些机制去回应那些最为弱势的全球公民。这些“旨在识别多边开发银行（MDB）不当行为的正式的制裁程序”正向那些受到负面影响的人们提供援助，而这些负面影响与这些组织资助的项目有关。举例来说，如果世界银行资助了一座桥梁的建设，该项目涉及房屋的拆除和居民的重新安置，那么，被该项目影响的居民可以向世界银行监察组（inspection panel）提出索赔。监察组将会对世界银行的政策和程序进行审查；如果违反了相关规定，那么监察组可以下令向受负面影响的人提供赔偿。

在该书中，作者苏珊·帕克提出了如下问题：为什么一个强大的国际机构其理事会中的国家代表们会自愿将权力移交给一个可能会对该机构进行制裁、强制恢复原状或减缓项目进程的独立小组，为什么要创建一个可能让组织或其理事会成员难堪的问责机制？

她的回答是，美国对“作为正义的问责（accountability as justice）”这一更广泛规范的承诺推动了 MDB 结构的变化。她通过建构主义框架和定性过程追踪得出结论，美国的承诺使得美国重新调整了那些通常用于确保 MDB 服务于美国利



益的审计和监督工具，转而促进对受援助项目负面影响的群体的响应。

本书第二章阐述了美国成为“规范企业家（norm entrepreneur）”的原因，以及美国推进 MDB 变革的战略。第三章对 MDB 的问责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详细介绍了作者所说的美国传统上对“作为控制的问责（accountability as control）”的关注，以及如何将其重新定位为“作为正义的问责”这一过程。第四章则具体介绍了 MDB 多年来试图避免、抵制和颠覆这种问责制度的大量细节。第五章和第六章描述了对影响人员的问责机制及其演变过程，同时，作者指出，这些机制对更广泛的 MDB 业务或组织文化影响相当有限。

作者详细记录了问责机制在 MDB 体系中的发展——从 1994 年世界银行最初的监察组，到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再到世界银行的其他机构，以及美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等。作者指出，虽然这些问责机制受到 MDB 员工和管理层的抵制，但在美国的支持下，它们变得越来越强大、独立和有效。作者写道，美国国会和美国财政部的成员都是第一批坚定的倡导者，他们确保美国利用自己的声音、投票权和金融杠杆推动改革。

本书的一大优点是它清楚地表明一些有权力的个体必然推动广泛的制度变革。这些人的行动不仅基于其现实的政治利益，而且还基于其对于正确和适当的观念认知，包括对正义的理解这类问题。在本书中，我们能够看到权力、结构和个人信仰交织在一起，从而在美国政府内部形成政策立场并且具象为可观测到的行动。例如，作者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当时大权在握的美国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在美国推进“作为正义的问责”这一过程。然而，在描述 MDB 时，作者却很少关注这些组织中的骨干的信念与行动是如何转化为组织级别的响



应与行动的。尽管本书访谈语料库相当丰富，但第四章近 70 页的篇幅对 MDB 的抵制记录了仅包含少数几个专有名词，这使得读者对权力、结构和个人信仰如何使 MDB 为应对美国而采取行动这一方面知之甚少。

根据我对该书的理解，建立 MDB 的问责机制，无疑是正确的一大步，毕竟，推动这些机制的美国是“善良的霸权（good hegemon）”。然而，对我来说，本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有关这些机制创造、传播、影响等方面的最为详尽的记述，并且作者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个问题——极少有监察组的指控被认定为真实，并得到实际裁决。（世界银行平均每年不到 4 起，亚洲开发银行每年略多于 1 起，参见本书第 207 页表 6.1。）这也就意味着，对那些受到负面影响的个人而言，这些索赔途径对他们权益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而这与我在阅读本书之前的想法截然相反。

因此，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间接影响占更大一部分。作者写道，问责机制从“控制”转变为“正义”，仍然通过审计、监管和事后调查发挥作用，它们可能会导致预期行为的改变。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项目设计更关注那些受影响的人，因为这些受负面影响的人可能会提出不满。然而，作者明确指出，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如此。这些问责机制对世界银行更广泛的文化和实践的影响极其有限。很遗憾，为受负面影响的人们伸张正义的准则并未超越 MDB 的补救机制。

让我更加担忧的是，基于我在多年的 MDB 研究和工作中的观察，间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占据了总影响的最大部分。我曾在多个项目中看到政府和 MDB 的工作人员努力避免援引 MDB 的非自愿移民或环境保障措施。因为这可能涉及到更加昂贵的项目设计，或者是将一些项目内容从 MDB 资助转移到非 MDB 资助，



耗时费力。简单地说，我认为至少在一些（或许多）情况下，作者在第四章组织层面对回避行为类型的分析也能够解释每个项目的实际情况。这些回避行为导致项目成本更高，而对受援国的净收益更少。

《善良的霸权》这一本书让我再次意识到，我们面临的是公正与效率的权衡，那些因公正而受益的人（进行索赔的项目影响者）可以算在一边，间接公正的收益接近于零，而间接效率的损失则是巨大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为推动“作为正义的问责”做出大量努力，从而推动了问责机制的产生，但这些机制事实上仅为极少数人提供了追索权，同时还对效率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本书指出了一个潜在的关键问题，未来的研究可能会进一步关注这些问责制度潜在的负面影响。

对受项目影响的人群的正义规范并没有通过问责机制广泛地扩散到 MDB 的组织文化和流程中。基于以上结论，我们要进一步追问，对于“作为正义的问责”在 MDB 当前和未来的潜在影响意味着什么，对于“规范企业家”通过问责机制来推动更广泛的规范变革，我们又能从中吸取什么经验？

这部巨著，凿凿可据，信而有征。读毕，一种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它是一种忧郁，混合着一丝怀旧和令人畏缩的古怪，这种感觉这令我十分惊讶，感觉就像让我去看几十年前的电视节目一样，里面的一些台词或人物在今天看来有些冒犯。我反复咀嚼作者在她的标题中使用的词汇——“善良”——一个强大的政府可能会利用他们的权力造福世界上最弱小的外国公民。报纸上的证据、与我学生的互动、自己参与的公共活动，都让我感觉美国世纪已经结束，通过现在美国政府运用道德权威的能力大幅下降这一事实，便可略知一二。我怀疑许多美国人就像我一样，对这种失去感到模棱两可，美国既失去了行善的能力，也失去了作恶的能力。我钦佩前国会议员弗兰克和他的政治遗产，但我现在很难在美国政府中



找到与他合拍的人。如果弗兰克议员仍在任职，他是否会如同作者记录的那样与他人合力促使美国采取行动，或者，如果美国采取行动，它是否能赢得认同，并以类似的方式推动 MDB 广泛的组织变革。不管怎么讲，这本书事实上更多地讲述了 MDB 和国际体系的历史，而不是它所导向的未来。而部分空白的未来，便是本书为未来学术探索开垦的一片沃土。

总之，本书提醒我们，MDB 的政策以及大国在多边论坛中的立场都不仅仅是理性选择利益的总和。在决定机构的改革方向时，主导者们的观念至关重要。毫无疑问，本书将在发展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的学者的书架上占有一席之地。

编译：牛嘉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 No. 6



汪建新

《世界经济》

2022 年第 12 期

**《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与全球贸易增长：以加入亚投行为例》**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加入亚投行是否能促进加入方对外贸易的增长？如果成员国存在出口增长效应，这种效应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起作用的？通过使用 2010 到 2020 年的全球贸易数据，并以 91 个国家加入亚投行作为准自然试验，文章研究发现，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以及加入亚投行之前的各国，加入亚投行的成员方整体上出口多 3% 以上的金额。在机制研究方面，文章则证明了亚投行切实推动了各成员方的基础设施投资，且基础设施投资数量和质量在促进出口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中间渠道作用。

在评估加入亚投行事件的贸易增长效应时，本文构建了一个反事实框架，以各成员方加入亚投行作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加入亚投行对各成员方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效应。

为提高识别的精准程度，本文采用了多种策略来最大可能克服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1）除了控制国家、产品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外，尽可能控制各国的人口、汇率水平、信贷资金投入和国民储蓄等时变变量；（2）在稳健性检验中，引入出口目的地，在回归中进一步控制是否加入亚投行变量和时间趋势的交互项；（3）控制是否属于亚洲开发银行（ADB）的线性时间趋势、与中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和时间固定效应的交互项、各国间政治外交关系以及是否签订区域经贸协定、进出口双方是否是 WTO 成员、双方是否是欧盟成员各自和时间趋势的交互项以及





新冠疫情的冲击等；（4）控制加入一带一路、新开发银行（NDB）、开通中欧班列与境外经贸园区等政策因子的双重差分冲击，尽可能消除其他混淆变量对政策效应的干扰；五，使用安慰剂检验方法，检验是否存在着其他不可观测到的并随时间变化的影响因素。

本文研究发现：

1) 相较于未加入亚投行国家以及未加入之前年份，加入亚投行对各成员国的出口贸易增长效应为正并且稳健；

2) 基础设施投资数量与质量是加入亚投行贸易增长效应的重要的中间机制。在把固定资产投资按资产属性分解成运输设备、ICT 和基础设施等，本文逐一识别了加入亚投行的动员效应，这说明了亚投行的设立确实通过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进一步推动了各国出口贸易增长；

3) 通过进一步排除各类影响因素对贸易增长效应的干扰，验证了加入亚投行贸易增长效应的稳健性。

本文的研究进一步回应了美国、日本等国家对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目标的担忧和不切实际的指控，证明了亚投行的成立从经济上推动了各成员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关联与贸易增长。

编译：杨易（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声明：对观点的摘录和引用不代表编者本人及其所属单位对观点的认同。





## 全球治理研究团队

任 琳 熊爱宗 鲁 桐 吴国鼎  
陈兆源 黄宇韬 韩永辉 宋 锦  
刘 玮 沈 陈 田 旭 彭 博

## 研究助理团队

兰馨彤 苏山岳 孟思宇 杨嘉豪

